

局事多暇说 ◆ 吴 忱

近来传出宋代曾巩的一纸手札,竟以两亿多身价成交的新闻,不由人也真想翻箱倒柜,说不准会有意外的奇迹。就这么一张纸,却使拍卖行赢在当下,而买家赌在了未来。至于一个书生,感兴趣的尚在这张纸究竟藏匿了怎样的密码。

清初卞永誉尝撰《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而在第十二卷就录入曾巩此札,题曰《局事多暇帖》,并注明:行楷书、印,书于纸背。文字如下:

局事多暇,动履提福。去远海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踰处穷微,日迷汨于吏职之冗,园艺有乐意耶。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迹,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罹,偶便,专此上问。不宣。巩再拜

运勾奉议无党乡贤。二十七日谨启。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人氏,有《元丰类稿》五十卷流布后世,名在唐宋八大家之列。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史书上说,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而奇之”。三十九岁,登仁宗嘉佑二年(1057)进士第,即调平州司司法参军。知府张伯玉听说欧阳修、王安石称誉曾巩能文,一日对巩说:“吾方作六经阁,君其为之记。”曾巩易稿六七,均不当伯玉之意,只得自作,于是提笔曰:“六经阁者,诸子百家皆在焉,不书,尊经也。”曾巩大服,自此益以峻洁自励。

四十二岁这年,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在京师凡九年。五十一岁时,自求补外,于是通判越州,知齐州,而后又历知襄州、洪州……。曾巩虽早负才名,但长期劳形在外,待得召回京师,十载风尘,已垂垂老矣。及至熙宁十年(1077)又移知福州,继而“进直龙图阁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马钤辖,赐五品服”。其时“大盗数起,公以方略,擒获募诱,亡虑数百人”(韩维《神道碑》)。是年曾巩五十九岁,其老母也已八十有七,为此,第二年便写下了《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略云:

况臣到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远去庭闱,为日已久,晨昏之恋,谊难苟止。伏见朝廷至仁,比来群臣之中,有欲便于养亲者,并蒙听许。况臣母子各已白头,兄弟二人皆任远地,今臣于官守,又无可以驱驰之事。伏望圣慈怜悯,以臣老母见在京师,与臣一在京主判闲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亲养。臣虽糜禄,曷报圣恩。臣不任惶惧战汗激切屏营之至。

文中所称的“曹局”就是官署,也指分职治理具体事务的官吏。可奏状写出不久,却又在六十一岁时(元丰二年)转而改知明州,当年五月再改知亳州,因而又有《移明州乞至京师迎



■ 北宋曾巩《局事多暇帖》

侍赴任状》以及《移亳州乞至京师迎侍赴任状》先后奏上。京师一时既不得召回,便只能乞求皇上许其迎侍老母随任。毕竟皇恩浩荡,曾巩终于遂了亲养之愿,并在《亳州谢到任表》中写道:“臣籍虽预于内朝,身屡更于外服。已凋零于齿发,转重于东南。曾未得望望于清蹕之间,参第颀于从官之后。惟坚悃悃,欲效毫分。今者获便养于亲闱,预分忧于辅郡。上体焦劳之意,敢忘夙夜之勤?宣化承流,方尽笃殆之力;望云就日,但倾葵藿之心。”这是作为古文家写的一篇骈文,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但曾巩在六十二岁那年,却又移知沧州,此时则有《授沧州乞朝见状》上奏:

臣远违班列十有二年,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伏望圣慈,许臣朝见。臣不任恳诚感激之至,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接着在赴任沧州途中,便道京师,觐见神宗。神宗劳问甚宠,“察公贤,留勾当三班院。数对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计。天子嘉纳之。”(韩维《神道碑》)从此曾巩便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而后十月二十六日,又赐对延和殿。“三班院”者,宋代官司名。

可以推定,《局事多暇帖》就是这一年写下的,受信者是一位已经三年没有谋面的乡贤:从文字的表层看来,此信是说:别来忽忽三年,踰处穷微,公事冗杂,日子过得并不愉快。而卸任时的交接之期日渐迫近,接替者的寂然无闻,也令人旦夕急切盼望。回想当年之能免于“旷弛”职守,实得益于“贤者”之力。夏秋之交,中途经过“府下”,(勾起往事),因以致谢意于万一。按“贤者”、“左右”,称呼对方的用语,“府下”,或系对方居邑,故原件换行抬头。最后,即以皇上召回擢用作结。寥寥数语,虽不乏礼节性的应酬,却道尽曾巩此时此刻的所思所历。

由于书信的私密性质,其行文之际每有不易为局外人所知的节略或隐词,如“旷弛”一语究竟所指何事就是。但不妨推测,此事至少发生在三年以前(“去远海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按年谱,这是曾巩在福州的第一年,也就是擒捕强盗

那年。也许曾巩是在这位乡贤的助力之下,才得以获免“旷弛”的。依据便在曾巩这个用词,与李纲《与张相公书》“群盗有名字者,并已招捕了当,实赖朝廷威德所及,获免旷弛”一句的场景,完全可以对接无缝。

结尾在“巩再拜”之后抬头落笔的“运勾奉议”四字,若与起手寒暄语“局(官署)事多暇”合看,那应该就是受信者的职衔。按“奉议”者,文散官名。隋文帝于礼部置通议郎,官从六品上。唐改为奉议郎,及宋初承唐制,官品亦同。太平兴国元年改为奉直郎。至元丰三年,又改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而“运勾”者,全称即转运司勾当公事,系差遣名。北宋熙宁三年始置,承办本司公事,一般由具备知县资历的京官或朝官充差。“运勾奉议”,也就是以奉议郎差充转运司勾当公事。此职在南宋改称干办公事,则勾当亦即干办,主管是也。然而此类职衔的过度简称,也不免引出一些议论,当初路国公文彦博就曾说过:“顷年,添差勾当公事,官吏转运司者曰‘运勾’,提举司者曰‘提勾’,盐司者曰‘盐勾’,措置司者曰‘措勾’,安抚司者曰‘抚勾’,官号之异,昔所无有。”只是到了今天,本来堂而皇之上得庙堂的所谓勾当,竟沦为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贬义,却是文彦博始料不及的了。

至于“无党”,有论者谓就是徐无党。然徐氏生卒不详(或说少曾巩五岁),只知浙江永康人氏,登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第,历知涪州,后为郡教授。按,《宋元学案》说其少日“从欧阳修学古文辞,尝注《新五代史》,妙得良史笔意”,而欧公则有《送徐无党南归序》。由于史料有阙,实难确定曾、徐彼此是否互有往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曾巩在信札最后称谓对方的“运勾奉议”,并未见之于徐氏的履历。是耶否耶,姑存此一说备考。

《局事多暇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版《曾巩集》未见收录。本世纪初出版的《全宋文》第一二四七卷则将此帖录入,并标示其出处在《六艺之一录》第三九四卷(撰者清初倪涛,浙江钱塘人,生卒未详)。至于原件首字读“局”而不读“扁”,那是可以比对《碑别字新编》得到确认的。

人人皆知知恩图报可贵,忘恩负义可鄙。可这忘恩负义的事,似乎最容易发生在本应为“万民之表”的皇帝身上。

中国历史上百演不衰的剧情之一,就是一帮兄弟九死一生帮助一人打下江山,扶他登上皇位,正等着论功行赏,却只盼来当年的兄弟翻脸不认人,甚至大开杀戒。这剧情如此历久弥新,大家见怪不怪,以致今天的电视剧仍常拿它当套路——不信请看去年热播的《琅琊榜》。

第一个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的皇帝大概要数刘邦。汉初三杰中韩信最倒霉。当初他襄助的要项是项羽,历史说不定会改写。韩信也不是没受到过诱惑,面对自立为王的游说他虽犹疑,仍是感于刘邦的恩情没有背叛。但他终究觉得自己的功劳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心中怏怏,以致被刘邦诱杀。而那位出了好主意杀了韩信的萧何,虽说赔了一辈子小心,到老也因为某次为老百姓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喜怒无常的汉高祖“下廷尉,械系之”(《史记·萧相国世家》)。尽管没关几天,可那么一把年纪,还身为堂堂相国,说扔监狱就扔,这待遇也挺让人唏嘘的。

三人中就张良最聪明。帮助刘邦成就帝业后,他便“学辟谷,道引轻身”(《史记·留侯世家》),终于成为唯一保全了家族、也保全了自尊的那一个,被司马光赞为懂得“明哲保身”。看看求仙的张良,再看看诛夷的韩信,系狱的萧何,司马光忍不住感慨了一句:“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资治通鉴·汉纪三》)对于张良求仙访道的真心,司马光是不相信的。是啊,即使是结局最好的张良,明知“神仙之为虚诞”(同上),也被逼到在人世间待不下去,要去求仙的份上,是够“难处”的了——可话又说回来,汉初这境遇就算“难处”,真不知司马老先生若活到朱元璋那会儿又该怎么说。

温公只下了个“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的论断,却没说为什么难处,大概见多了史书上的斑斑血迹,对这等事也早就习焉不察了。近来读书,无意间发现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琼森的《谢难努斯》一剧中有句话倒是可作现成的答案:“比起无法报偿的功劳,还有什么更能刺伤皇帝的威仪和尊严?”

谢难努斯史上确有其人,不过不是英国人,而是古罗马人。为什么琼森写古罗马历史剧?是因为那会儿的英国人跟我们一样喜欢历史题材,可自己的历史又实在不值一提,于是就去写古罗马历史,《谢难努斯》就是部“历史正剧”。换了历史,换了民族,换了语言,没换的居然是剧中的皇帝也在杀功臣。被杀的西里乌斯在临死前怒斥当朝皇帝提比略:“对你来说,一个人的服务只有在能够给以报偿的时候,才是受欢迎的。一旦超过这一点,你想做的就不是感谢,而是杀人了!”

作为“历史正剧”,西里乌斯这句话可是有出典的,它出自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编年史》。不过原文稍有不同,没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对你来说”,句末令人心惊的“杀人”也只作“憎恨”。这便是史家和作家的区别。塔西佗一下子就把针对某个邪恶皇帝的控诉普遍化为对世道人心的洞察。欠下人情如同欠钱,总是要还的。还不起的债,对懂得知恩图报的正常人来说都会是一个心事,甚至会变成负担,皇帝也不例外——对少数欠了债还当自己是爷的除外。功臣的功勋就是施给皇帝的一份人情,皇帝在地位上占强势,在道德上却处弱势。为了报答这

份人情,他必须给功臣以奖赏。可功臣所给的人情往往是江山万里,即便贵为皇帝,也还不起或者不愿付这么大的代价去还。无法报答的恩情会让皇帝的地位尊严受到伤害,这时事情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皇帝会利用地位上的强势来消除道德上的弱势——除掉施恩的人——以弥补心理的刺痛。

遇到同等境遇,世人对恩人的心理很可能也会从感谢滑向憎恨。只是对普通人来说,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般能做的也只有咬牙切齿一番而已。不过也有“不一般”的普通人。邵毅平先生在《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的“感恩是一种负担”节中,讲过一个普通人因报不起恩、竟至要杀恩人的故事,非常触目惊心。遇到报不起的恩时,因为皇帝权力太大,正方便杀人,他们杀人我们不以为怪也不会多想,以至于只有当普通人也动了杀心的时候,我们才会震动。这难怪我们势利,把皇帝另眼高看了。

也正因为大恩难报,能倾尽所有、不顾性命也执意要报恩的近乎侠客的作风,便成了最值得歌颂的对象,司马迁就用激赏的笔触描写了这样一群人。《史记·刺客列传》中不乏为报知遇之恩,不惜用极残酷的方式结束自己性命的义士。为给智伯报仇而变名、漆身、吞炭,三番五次去刺杀赵襄子的豫让就是典型。

但我们不能忽略刺客们背后的一点。古礼云:“父母存,不许友以死”(《礼记·曲礼上》),刺客们多是在斩断世间牵挂后才行动的。《刺客列传》中的另一位刺客聂政,一直等到母亲死后才动手。还有一位专诸,《史记》里虽没有记载他

的亲人,但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如元杂剧《说专诸伍员吹箫》中,他已无父无母,临行前妻子也自刎以励其志。由此可见,即便这些刺客报恩的阵势看起来已足够壮怀激烈,惊心动魄,拼尽的也往往只是自己的性命。至于其他的东,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然而,这样不顾一切的报恩皇帝们做不来。他们在世间的牵挂原比自己一条性命要多得多,让他们舍得放手自然也就更难。而作为类传出现在正史中的“刺客列传”,《史记》首秀后也成了广陵绝响。

人们往往以为这样做的皇帝定是生性歹毒,文学作品也经常把他们写成这样——因为并非所有的皇帝都忘恩负义。东汉的刘秀比起西汉的刘邦来,对功臣就好很多。宋太祖赵匡胤更是用一个“杯酒释兵权”的小小策略,就既避免了重蹈杀功臣的覆辙,又保住了一众功臣的荣华富贵。其实人心都有善恶两面,也都有趋利避害的自私本能。把谁摆在这样的高位,让其面对这般大恩大德,恐怕心中恶的一面都更容易被激发出来。正因为如此,皇帝才比普通人更容易忘恩负义,他们的知恩图报也比普通人更难。

最后说句题外话。现如今感恩教育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当下,知恩图报自然值得提倡。但凡事过犹不及,过于强调让受者感恩,无疑是在将施者的功劳无限制放大,而这对施者来说并不全是好事。报不起的恩一旦成为不堪的重负,我们回看历史,就知道又有几人愿意割舍一切去偿还。做了好事的善人理应获得回报,即便不求回报,也断然不愿陷人被人憎恨的境地。我们面临的人心并不尽善尽美,那些不光彩的地方,我们不愿将之夸大,却也不能不面对。

报不起的恩

◆ 小山



■ 东汉画像石。从右到左依次为“要离刺庆忌”、“豫让刺赵襄子”和“聂政刺韩王”。